

赶超型工业化的模式变迁

与经常项目顺差^{*}

——一个经济史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视角

王剑锋¹, 顾 标², 邓宏图³

(1.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应用金融研究中心, 北京 100029; 2. 上海大学 经济学院, 上海 200444; 3. 南开大学 经济研究所, 天津 300071)

摘 要: 文章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的整体性分析显示, 与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存在对外需和外资的双重需求不同, 重工业优先模式遗存的高储蓄率体制使中国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更多地表现为对外需拉动的单一需求。中国在总体并不缺乏资金的情况下, 随着政府对加工贸易型FDI的优惠力度不断升级, 出现了资本顺差带动贸易顺差增长的现象。

关键词: 赶超型工业化; 工业化模式; 经常项目顺差

中图分类号: F1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9952(2013)07-0061-11

一、引 言

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的相继爆发导致外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急剧下降。在此背景下, 研究巨额贸易顺差成因问题的紧迫性似乎有所下降。然而, 贸易顺差问题依然存在, 既有的诸多研究也未能对我国外需依赖现象的历史成因和体制因素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理论研究的不彻底会带来如下不利后果: 其一, 短期经济政策无法完全消除经常项目顺差的反弹压力; 其二, 虽然“十二五”规划和“十八大”报告明确将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 但外需依赖问题的持续存在无疑会给经济社会转型带来巨大的制度成本, 从而使中国未来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仍然遵循旧的模式而无法实现真正突破。

收稿日期: 2013-03-25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资助项目(13YJA79011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资助项目(11AZD005)

作者简介: 王剑锋(1974—), 男, 河北定州人,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应用金融研究中心副教授, 博士;

顾 标(1975—), 男, 江苏通州人, 上海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博士;

邓宏图(1966—), 男, 江西高安人,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 博士。

我们认为,应该重视新中国成立后 60 余年历史的整体性分析,而不应人为割裂前后两个 30 年的内在联系。为此,我们将研究视野拓展至计划经济时期,并得到如下结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主流意识形态、国际环境差异等因素会对一国工业化的模式选择构成重要影响,但在经济体系内部,政府行为导致经济结构失衡的逻辑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市场化取向改革以来,与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对外需和外资具有双重需求不同,中国重工业优先模式遗存的高储蓄率体制使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模式更多地表现为对外需拉动的单一需求。中国在总体并不缺乏资金的情况下,随着政府对加工贸易型 FDI 的优惠力度不断升级,出现了资本顺差带动贸易顺差增长的现象。这意味着,由于缺乏经济史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视角,此前诸多的解释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基于此,本文将在这方面做出努力,为中国贸易顺差的历史和制度成因提供一种新的解释。

二、文献评述:经常项目顺差何以出现

近年来,围绕中国经常项目顺差问题涌现出大量文献。Makin(2007)、Feldstein(2008)等认为,中国经常项目顺差源于中国政府操纵汇率,^①Polak(2001)、彭兴韵(2010)则认为,经常项目顺差主要源于货币因素。^②之后,诸多研究采用“吸收分析法”和“两部门分析法”来探讨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的原因。

吸收分析法的前提假设是,经常项目余额能够用来平滑国内供求失衡。与之相对应的分析逻辑是储蓄投资差额论(Louis,2005),前者大于后者,顺差也就产生了。^③

作为“吸收分析法”的发展,一些研究探讨了经济体制改革与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机制。Song 等(2011)认为,由于国有工业企业更容易从国有银行获得信贷支持,因而在国企占比较高的时期,融资体系的配置率较高,国内投资对国民储蓄具有较强的吸收能力。随着非国有工业企业比重的上升,储蓄配置率出现下降,越来越多的储蓄无法转化为国内投资,只能以出口的形式转移到国外。^④Ju 等(2011)强调了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工业内部产业结构调整及其贸易顺差效应。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贸易自由化会导致资本回报率下降和劳动回报率上升,投资储蓄比将减小,“富余”的储蓄部分就以顺差的形式流向国外。^⑤

两部门分析法(Obstfeld 和 Rogoff,2000)的逻辑是,贸易顺差源自国内贸易品和非贸易品之间供求的失衡。张斌(2006)在区分了贸易部门生产函数与非贸易部门生产函数后发现,工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对上升导致供给结构变动,是贸易顺差持续扩大的主要因素。还有一些研究注意到外国直接投资对工业产出和经常项目顺差的影响(谢建国,2005;江小涓,2002)。^⑥在卢锋(2006)看来,双顺差的直接原因是加工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双重作用,在

以产品内分工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大幅降低了参与国际分工的交易成本,企业和劳动者通过学习和创新发挥中国资源比较优势和大规模优势,于是出现了双顺差。^⑦

余永定和覃东海(2006)关注了政府在吸引 FDI、促进出口增长中的作用,在他们看来,政府将引资数量作为官员考核指标,通过各种优惠政策吸引 FDI,结果造成出口额和贸易顺差大幅增加。^⑧刘伟等(2007)的实证研究表明,1998—2003 年中国政府实施的以出口贸易导向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通过强化价格竞争优势,使贸易顺差大幅增加。^⑨

上述研究使学术界和实务部门更加关注贸易顺差和产业失衡间的内在关系,但应当看到,许多研究缺乏历史视角,没有意识到经常项目顺差在相当程度上是“经济赶超”意识影响下工业化战略选择的结果。我们发现,在 1991—1998 年期间,国企产值比重以每年 4 个百分点的速度大幅下降,之后的降幅则明显趋缓,这使我们意识到 Song 等(2011)的结论缺乏现实解释力,因为在他们研究的样本期间(1997—2007 年)国企产出比重并没有根本性降低。导致其判断偏误的原因是错将国企账面劳动力人数比重作为产出比重的替代指标。20 世纪 90 年代,大量国企职工处在“实际”失业状态,这意味着正是国企破产、改制工作的滞后而不是别的原因,使国企职工人数在“账面”上的大量减少与经常项目顺差比重的增长出现高度契合。

Ju 等(2011)的结论在逻辑上不够可靠。按照他们的分析,资本回报率的下降将导致资本流出,如此一来,中国的资本和金融项目应该出现逆差才合乎逻辑,现实情况却在他们研究的样本期间给出了相反答案,中国的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同样居高不下。此外,实际数据并不支持 Song 等(2011)和 Ju 等(2011)的结论。中国工业企业就业人数(万人)与增加值(亿元)之比从 1991 年到 2007 年并没有上升,相反却从 1.108 下降到 0.037。同期固定资产与增加值之比仅从 2.03 下降到 1.05。即便是考虑每年 10% 的工资上涨率,资本与劳动之比也是不降反升,足见中国并未明显转向劳动密集型产业。^⑩从“固定资产净值平均余额/增加值”和非金融企业“资本形成总额/总储蓄”两个指标来看,它们的大幅下降主要出现在 2004 年以前而不是之后,以此来强调 2001 年“入世”对 2004—2007 年顺差大增的影响,理由似乎并不充分。即使资本密集度下降的结论在长期中能够成立,那么为什么其他私有经济比重更高、贸易自由化更早的国家却没有呈现类似的“中国故事”呢?显然, Song 等(2011)和 Ju 等(2011)的研究都无法提供合理解释。卢锋(2006)的研究同样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就能吸引大规模的工业 FDI,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却没有做到,这使其研究结论既缺乏一般性,也缺乏特殊性。刘伟等(2007)、余永定和覃东海(2006)的研究把政府积极干预当作给定前提,但没有意识到这同样是需要解释的。

基于上述讨论我们认为,从经济结构角度解释贸易顺差,需要一个隐含的前提,即中国的改革开放具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起点。而要弄清楚这个起点的历史来源及作用原理,就必须从经济史和政治经济学的双重角度进行分析。这正是本文接下来要做的工作。

三、重工业优先的经济逻辑与经常项目的逆差压力

任何一个国家在决策经济发展战略时都会受到自身禀赋状况的基础性制约,但除此之外,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以及所处国际环境也具有重要影响,并可能使其与自身的禀赋发生偏离。新中国成立后,饱受战争煎熬的中国民众对新政权寄予了很高的期望。而几乎在同一个时代,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相对照,苏联利用计划经济体制实现了高速增长。显然,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特定时期成功的经济实践引导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政府认识到,充分利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计划体制,完全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与此同时,为了与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抗衡,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成员,中国也面临着短期内必须实现经济国防实力快速增长的直接压力。由此,“高速”与“赶超”自然就成为新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选择中的核心,并一直延续至今。

而在实现经济赶超的路径选择方面,列宁有关“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的和唯一的基础,只有一个,这就是大工业”的有关论断,以及同时代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工业高度发达国家的现实,都使中国政府将迅速提高工业化水平确定为首要目标。在工业部门内部,作为机器设备和钢铁等基础性工业原材料的提供者,重工业部门始终起到核心和枢纽作用。当时面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封锁的现实,中国无法通过国际经济交往从外部获得足够的重工业产品,其间又屡次面临战争的威胁,这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必须着力建设门类齐全的重工业体系。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战略由此成形。

确立工业化目标模式后,就需要落实到制度设计层面。曾经的“落后”国家日本、德国和苏联,通过工业化实现强国的经验表明,在外有列强压迫、内无充足资金的情况下,落后国家要想迅速实现工业化,必须充分发挥政府在经济中的积极干预作用。对新中国而言,无论是出于意识形态考虑,还是基于模仿苏联实践的便利性,都会参照政府主导经济的苏联模式,故在制度、组织设计以及财政金融体制构建上无不以工业化为目的。由于受到经济资源国际可得性的制约,中国必须在国内构建一个为工业化筹集大量资金的制度体系。为此,中国政府先后实施了“三大改造”、银行“国有化”等一系列措施,通过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大幅提高积累率和投资率。这是国家在封闭条件下的必然选择,并由此带来一系列重要的历史后果。

(一)政府对土地、工业部门以及金融体系的控制

为了确保重工业化筹资渠道的畅通,中国对农地制度和工商企业的所有制类型进行了改造。原因在于,农地私有制的存在等于承认其市场权利,这很难与低价垄断收购农产品的制度相容,因而土地公有制被确立并延续至今。同样,为了确保工商企业的利润能够转移到政府手中,工商企业实行了国营化。为此,除了没收官僚资本以外,国家还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另外,效仿苏联模式,中国政府建立了高度集中的金融体制。这意味着在计划体制下除了金融体系主要发挥“账簿”功能以外,政府还将不属于财政所有的居民储蓄资金也纳入了调控范围。在上述背景下,非国有银行机构逐步被取消,中国政府全面掌控金融体系。

(二)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

服务于重工业优先赶超战略的一系列制度安排通过挤压农业部门的收入和压低居民消费支出,大幅提高了整个经济的储蓄率。根据世界银行发展指数数据库提供的资料,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储蓄率为29.1%,高于加拿大的24.2%。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储蓄率为26.6%,在人均GDP仅有发达国家几十分之一的情况下,储蓄率却高于加拿大的22.59%、法国的23.21%、美国的18.98%、德国的23.83%和英国的20.25%。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简单平均储蓄率为35%,不仅高于世界平均的22.37%,还明显高于高收入国家的22.47%。^⑩在投资方面,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投资率为27.36%,而同期数据可得的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全部国家三个组别的投资率仅分别为23.13%、24.73%和23.27%。在1952—1969年,中国的平均投资率高达27.11%,高于高收入国家20世纪60年代的21.73%。^⑪中国的人均GDP低于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但储蓄率和投资率却高于其他国家,这无疑反映了政府主导型经济管理体制在提高积累率方面的巨大作用。

(三)相对于服务业的高工业比重以及重工业在工业部门中的高比重

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下,政府投资向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倾斜产生了两个结果:一是工业部门相对服务业的高比重,二是重工业在全部工业中占过高的比重。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的工业比重达到了21.71%,高于服务业的13.29%。在数据可得的其他主要国家,虽然同期大部分国家工业部门的绝对比重都略高于中国,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中国,即使是其中最低的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按照2000年的价格计算,20世纪60年代的人均GDP也达到了200美元,大约是中国两倍。同时,这些国家工业与服务业的相对比重又远低于中国。这反映了中国工业部门相对于服务业部门的过快增长。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工业与服务业比重分别为29.67%和22.3%,而高收入、中等收入国家组别和全部国家组别的工业比重分别为32.07%、32.11%和32.14%,服务业比重则分别为59.24%、44.28%和56.80%,工业比重都明显低于服务业比

重。经济发展水平与中国更具可比性的低收入国家服务业比重约为 41%，而工业比重仅为 18.8%。^⑬ 1953—1978 年，按照不变价计算，中国工业增加值累积增长了约 16 倍，而第三产业增加值仅累积增长了约 3 倍。^⑭ 重工业和轻工业总产值分别增长了约 27 倍和 8 倍，重工业的增长速度远高于轻工业。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 26.41% 上升到 1978 年的 61.26%。^⑮ 需要指出的是，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和较高的工业化率使中国拥有了包括“更多制造设备、技术水平和熟练工人”在内的工业化基础，这无疑为改革开放后吸引工业 FDI 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的投资偏好强，资金和资源的需求量大，理论上对外贸易应呈现巨额逆差。而在当时封闭的国际经济条件下，国内供给与需求不得不实现自我平衡。但无论如何，逆差压力是存在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计划时期的“短缺”现象。封闭经济等有关条件一旦改变，工业化战略的实施模式就会发生变化，只不过重工业优先战略遗存的“高储蓄率”等历史后果作为新的禀赋条件会对工业化模式与贸易余额的变迁路径产生额外影响。这就使我们不得不相信，改革开放以来的贸易逆差或顺差有其历史逻辑。据此，我们得出如下命题：

命题：一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国际政治与经济环境、意识形态和经济资源禀赋共同决定了该国工业化模式的选择及其经常项目余额的表现。在长期中，经常项目余额由经济发展战略、国际环境、意识形态以及经济资源禀赋共同决定。

根据上述命题，同时结合中国 1949—1978 年期间的工业化战略、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意识形态以及经济资源禀赋的总体情况，可以通过推论 1 归纳计划时期的工业化模式选择与经常项目表现：

推论 1：给定一个落后大国“坚定的工业化战略”、冷战格局下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等条件，以政府为主导的重工业优先战略和巨大的投资需求就被内生决定。由于投资需求超过储蓄，在开放条件下本应呈现贸易逆差，但在封闭的计划经济时期只能变形为“短缺”现象。

四、增量改革、内需与经常项目余额变化

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中美、中日等一系列外交突破，中国的国际政治环境明显改善。与此同时，有关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特征的认识也出现了变化，中国政府开始改变计划时期重工业封闭循环推动的工业化模式，转而实行以集体经济为所有制重点、以轻工业和服务业为产业重点并侧重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量改革战略。然而，中国政府通过工业化实现快速经济增长的“工业化战略”一直在延续，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一方面，与工业化投资相关的地方政府预算外及隐性债务收支明显增长，表明政府依然是国内经济过热发展的

重要推手；另一方面，放权让利带来的居民储蓄增长也经由政府控制的金融体系以“配套资金”的形式继续用于工业化投资，国内投资的资金压力依然存在。只不过与计划经济时期相比，所有制增量改革带来的预算约束硬化缓解了这一时期作为贸易逆差另类形式的“短缺”程度。同时，这一阶段的工业化主要服务于计划体制下受到长期压抑的消费需求的“补偿性”增长，因而这一时期的外向型经济比重与经常项目顺差都处在较低的水平。

从具体过程看，虽然政府在改革之初对外资还持谨慎的态度，但对国内非国有经济尤其是集体经济则明确予以支持。国务院于1979年3月颁发了《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为社队企业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同时，在商品流通体制“三多一少”原则的指导下，国营商业企业获得了较快发展。在居民收入和消费需求方面，受“放权让利”改革原则的影响，政府陆续出台了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和职工工资的政策。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的增长带动了整个经济对轻工产品及非贸易品需求比重的上升。在上述背景下，一方面，集体工业经济在整个工业中的比重迅速提高；另一方面，轻工业与服务业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也明显上升。1978年，集体企业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仅为22.37%，而最高的1992年则达到了35.07%。“六五”时期，按不变价格计算，中国第三产业年均增长15.2%，远高于同期工业部门9.9%的增速。“七五”时期，第三产业的年均增速也高于工业部门。而按照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1981年轻、重工业总产值分别为2663亿元和2515亿元，1990年分别为6503.14亿元和6520.59亿元。与计划经济时期相比，1980—1990年，轻工业增速大幅滞后于重工业的局面得到了明显改善。^⑩

总的来看，受放权让利以及消费性支出“补偿性”增长的影响，中国的储蓄率在20世纪80年代并未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出现上升，而是在继续保持高位的同时略有下降，从1978年的37.9%下降到1989年的35.5%，其中1981—1983年，甚至下滑至32.9%—33.6%的区间。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受自力更生等意识和思维惯性影响，这一时期的中国总体上对外资和外需仍然保持了谨慎态度，主要还是通过放权让利改革释放出曾被长期压抑的国内消费需求，以填补因重工业投资相对下降带来的需求缺口。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轻工业和服务业在“六五”和“七五”时期出现了恢复性增长，两者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重工业。由于重工业的资本密集度远高于传统的服务业和轻工业，上述产业结构调整也带来了中国投资需求的相对减少，在计划时期因资本需求大于资本供给而形成的逆差压力明显下降，即使在国际经济资源可得性明显改善的情况下，中国的投资率依然从1978年的38.2%下降到1989年的36.6%，其中最低的1982年甚至下滑至31.9%。在对外贸易结构方面，以外资为主体的加工贸易无论是规模还是所占比重都还较小，其进出口总额在全部进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仅为23%，与国内需求紧密关联的一般贸易则占绝

大部分比重,这决定了 1979—1991 年中国仅有 0.22% 轻微顺差的总体外贸特征。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如下推论:

推论 2:在给定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步开放经济贸易环境等条件下,随着居民收入比重的提高和消费需求的补偿性增长,重工业优先增长模式被更全面的工业化模式所替代,短缺经济在贸易顺差和国内需求的双重压力下逐步消失。

五、增量改革、外需与经常项目顺差增长

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开始,在支撑中国持续快速增长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的轻工业和集体经济逐渐显露出一些不足,一是国内“补偿性”的消费需求增长效应发挥殆尽,二是中国储蓄率虽然由于政府投资意愿强烈、计划经济时期“高储蓄意识”等因素继续保持了较高的水平,但国内信贷资金分配中的结构性问题却日益突出。曾经被视为增量主体的国内非国有经济由于不能从国家银行获得足够的信贷支持,无法继续支撑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缓解这个矛盾的重要出路是引进加工贸易型外商投资。但与多数发展中国家对“外资与外需”的双重需求不同,中国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更多地表现为对“外需拉动”的单一需求,即中国在高储蓄率下,需要外资带来的国外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政府给予加工贸易类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明显升级。在经历了 1989 年和 1990 年两年特殊影响后,政策的作用最终在 1992 年邓小平南巡的直接刺激下开始显现。

表 1 显示,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工业 FDI 所占比重迅速上升,相应地,由其带动的“三资”企业工业总产值比重则从 1994 年的 9.47% 上升到 2005 年最高的 35.92%。其中加工贸易型 FDI 的涌入在带来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的同时,由于其满足的是国外需求,因而造成了工业部门相对于服务业部门的再度扩张。虽然是引入“资本”,却实现了包含“劳动力报酬、折旧、间接税、企业盈余”在内的顺差。^⑦表 2 中的数据也支持了上述判断。在有关不同贸易方式顺差贡献的统计中,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FDI 成为加工贸易顺差的主要贡献因素,同时加工贸易带来的顺差对总顺差的贡献比率出现了大幅跃升。在 1990 年、2000 年、2005 年、2009 年和 2010 年这五个时点上,该比率分别为 76.2%、187.0%、139.7%、135.2% 和 177.8%。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般贸易和其他贸易方式则在大部分年份出现逆差。^⑧这说明外资主要流入加工贸易领域,并带来中国加工贸易顺差进而整体顺差的迅猛增长。实际上,外资流入及其对贸易结构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被视为中国经济的“体外循环”。相比之下,中国在非加工贸易领域接受的外资较为有限,也未遭遇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交通、能源等领域发展中面临的资金困境,这就说明中国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模式主要呈现出对外需的“单一需求”,而非对外需与外资的“双重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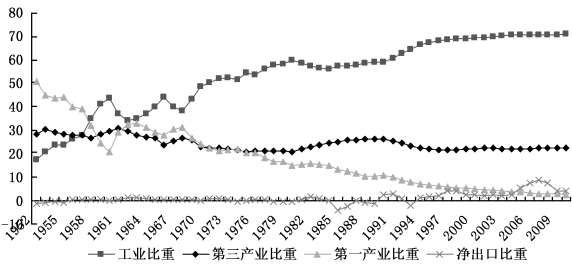
表 1 不同时期工业 FDI 占全部 FDI 和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 (%)

年 份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90 年代
占全部 FDI 比重	81.7	80.4	56.9	45.9	53.1	67.5	68.9	68.8	64.4	66.63	63.93
占资本形成总额比重	2.02	2.37	3.42	4.63	7.60	8.30	8.30	8.61	7.74	6.75	7.01
年 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00 年代
占全部 FDI 比重	70.4	72.5	73.5	72.1	73.7	73.3	66.4	56.7	56.5	54.9	65.89
占资本形成总额比重	6.81	7.07	7.04	5.71	5.35	4.65	3.59	2.91	2.62	2.05	3.91

注：资料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方法是将各期的工业 FDI 实际投资额和全部 FDI 实际投资额分别求和，再计算工业 FDI 所占比重；另外，1996 年及之前的年份未提供工业 FDI 实际投资额，我们利用数据可得的协议投资额代替。

根据图 1，以 1952 年为基期，中国按不变价计算的工业比重从 1952 年的 17.64% 上升到 2010 年的 71.25%，服务业比重的变化则相对平稳，从 28.16% 下降到 22.30%。其中，除了在计划经济时期大幅提升以外，工业比重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则呈现相对平稳的态势。在 1992—1996 年再次显著上升，2001 年以后又出现了轻微上升。应该说，工业比重的上述变化大体对应了我们对不同时期经济体制及相关改革效应的分析结论。总的来看，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开始，受国内“补偿性”消费需求增长效应发挥殆尽等因素影响，中国工业化战略的重点逐步从国内非国有经济转向了加工贸易型 FDI。据此，我们提出如下推论：

推论 3：给定经济持续高增长的目标，随着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效应发挥殆尽，中国政府不得不选择外需拉动型的工业化模式。在总体并不缺乏资金的情况下，随着政府对加工贸易型 FDI 优惠力度的不断强化，中国逐步出现了资本顺差带动贸易顺差的“双顺差现象”。



注：工业比重、第三产业比重和第一产业比重按照 1952 年的不变价格计算，净出口比重使用了现价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历史核算资料 1952—2004》以及《中国统计年鉴 2011》。

图 1 1952—2010 年工业、第三产业、第一产业比重及净出口所占比重

表 2 历年中国的全部贸易顺差、外资企业的贸易顺差及所占比重

	1992	1995	2000	2005	2010
外资企业的贸易顺差 (亿美元)	-90.15	-160.67	21.69	567.26	1 238.42
全部贸易顺差 (亿美元)	43.50	166.90	241.10	1 020.00	1 815.10
所占比重 (%)	-207.23	-96.27	8.99	55.61	68.23

数据来源：根据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中“各地区外商投资企业货物进出口总额”和“全国进出口总额”数据计算而得。

六、总 结

本文试图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后 60 余年的历史进行整体性分析，为产业结构变迁和经常项目顺差的变化提供一个宏观图景。自 1949 年以来，中国政府

始终将经济赶超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目标,并由此内生决定了工业化模式和经常项目余额的变迁路径。然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主流意识形态和国际环境差异会对一国工业化的模式选择构成重要影响,但在经济体系内部,政府行为导致经济结构失衡的逻辑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只是投资需求超过储蓄在开放条件下本应呈现贸易逆差,在封闭的计划经济时期却只能变形为“短缺”现象。自市场化取向改革以来,尤其是在集体经济与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效应发挥殆尽之后,与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存在对“外需和外资”的双重需求不同,重工业优先模式遗存的高储蓄率体制使中国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模式更多地表现为对“外需拉动”的单一需求,这使中国在总体上并不缺乏资金的情况下,随着政府对加工贸易型 FDI 的优惠力度不断升级,出现了资本顺差带动贸易顺差增长的现象。总的来看,时至今日,计划时期形成的赶超型体制仍然具有重大影响,对其历史作用也应客观看待。我们认为,在当前要求政府放权的呼声中,应当重视政府权力的整体性调整,即具有官员自利性的权力需要下放,但具有利他性的责任如环保、食品安全等则需要加强。当然,对于具体细节还需进一步的分析。

* 本文还得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师学术创新团队项目资助。感谢审稿人在论文逻辑方面提出的宝贵建议,使本文更加完善,但文责自负。

注释:

- ① Makin A J: Does China's Huge External Surplus Imply an Undervalued Renminbi? China and World Economy, 2007, 15(3): 89—102; Feldsteins S M: Resolving the Global Imbalance: The Dollar and the US Saving Rat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8, 22(3): 113—125.
- ② Polak J: The Two Monetary Approaches to the Balance of Payment: Keynesian And Johnsonian, IMF Working Paper, 2001; 彭兴韵:《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及多元化进程的中国选择》,《金融评论》,2010 年第 5 期,第 8—27 页。
- ③ Louis K: Investment and Saving in China,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3633, 2005.
- ④ Song Z, Kjetil S, Fabrizio Z: Growing Like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1, 101(1): 201—241.
- ⑤ Ju Jiandong, Shi Kang, Wei Shang jin: Are Trade Liberalizations a Source of Global Current Account Imbalances? Tsinghua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 2012.
- ⑥ 谢建国:《外商直接投资、实际有效汇率与中国的贸易盈余》,《管理世界》,2005 年第 9 期,第 36—47 页;江小涓:《中国出口增长与结构变化:外商投资企业的贡献》,《南开经济研究》,2002 年第 2 期,第 30—34 页。
- ⑦ 卢锋:《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现象研究:对中国外汇储备突破万亿美元的理论思考》,《世界经济》,2006 年第 11 期,第 29—38 页。
- ⑧ 余永定、覃东海:《中国的双顺差:性质、根源和解决办法》,《世界经济》,2006 年第 3 期,第 31—41 页。
- ⑨ 刘伟、胡兵、李传昭:《财政赤字、实际有效汇率与贸易收支》,《管理世界》,2007 年第 4 期,第 32—39 页。
- ⑩ 数据来源:1991—2007 年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引自 1993—2010 年《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 ⑪ 中国 1982 年之前的数据来自:《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历史核算资料(1952—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5 年版。其余年份的数据以及其他组别和国家的储蓄率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发展指标数据库。
- ⑫ 中国 1952—1969 年的投资率数据来源:《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5 年版。高收入国家数据则来源于世界银行发展指标数据库。
- ⑬ 各国的工业和服务业比重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发展指数数据库。
- ⑭ 数据来源:《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5 年版。
- ⑮ 数据来源:1981—1985 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 ⑯ 1984 年之前的数据来自 1984 年《中国统计年鉴》,其余数据则来自对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
- ⑰ 由于无法从公开资料中获取加工贸易 FDI 的准确数据,表 1 中我们选择以工业 FDI 指标予以代替。在政府以加工贸易为政策扶持重点的背景下,上述替代应该不会对分析结论产生重大影响。
- ⑱ 数据来源:2008 年及之前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009》,2009 年和 2010 年的数据则来源于《中国的对外贸易》, 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11-12/08/content_24099720.htm。

The Transition of Catching-up Industrialization Mode and Current Account Surplus: A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History and Political Economics

WANG Jian-feng¹, GU Biao², DENG Hong-tu³

(1. Research Center of Applied Finance,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3. Nankai Institute of Economic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Through a holistic analysis of two 30 years before and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is paper reaches the conclusions that different from dual demand for external demand and foreign investment in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system of high savings rates caused by heavy industry priority mode leads to export-oriented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mainly driven by single external demand. It shows that in the case that China does not lack funds, capital surplus gives rise to the increase in trade surplus with the continued improvement of preferential policy on processing-trade-based FDI.

Key words: catching-up industrialization; industrialization mode; current account surplus

(责任编辑 金 澜)